

## 壹、緒論

對身處在以數位科技為主要生活、溝通與學習工具，且表現出熟悉與頻繁使用特徵的新世代而言，其於日常生活中花費大量時間沈浸、融入及參與數位世界，內在思考語言亦偏向於電腦或網路科技的數位語言處理之思考邏輯，且習慣將數位科技視為生活工具與行為表徵的一部分，表現出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的特色（Prensky, 2001）。此種數位化生活方式、思考邏輯與行為表現，對於從未接觸過數位科技或將數位科技視為學習、工作與生活的新興應用工具之傳統世代人們而言，很難理解數位原民為何會花許多時間使用數位科技，且表現出與傳統思考習性及生活作息完全不同的數位化生活行為。傳統世代對比於數位原民而表現出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之特徵，其對數位科技的看法僅限於新興工具之應用而已，並未將數位科技所建構的數位社會及文化思考邏輯融入或內化為原生思考模式，亦與數位原民在數位生活模式及思考習性產生極大的落差。

對具有數位原民世代發展特徵的大學生而言，網路科技不再是數位移民的教師或成人所認為新興且陌生的工具，其已普遍存在於大學生的學習與生活歷程中，以為心理思考的深層內化或行為表現之鑲嵌轉化的角色扮演工具（蒯光武、陳浚卿，2010；Lu, Ma, Turner, & Huang, 2007）。當大學生視網路科技為有用且有意義的學習工具時，比較有意願來學習如何善用機會與實踐能力以控制及使用網路科技，容易產生正向感受且表達持續應用此工具來發展網路素養的思考（Verhoeven, Heerwagh, & De Wit, 2010）；亦經由網路互動過程所提供的機會進行學習討論與專業成長，提升學習互動品質與成就表現（陳彥廷，2010；劉漢欽，2006）。大學生可運用具有連線上網設備的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開啟網路瀏覽軟體蒐集資料與進行社群互動，並使用學校提供的數位課程學習平台或學生學習歷程系統，閱讀教學資料、參與師生或同儕學習活動、上傳作業與分享學習歷程。

網路科技客觀中立的工具面貌，受到整體人類社會價值與科技意識型態的影響，以及網路科技本身及其銜接歷史、文化與社會之負面形塑，逐漸轉變為具有社會操弄意涵的人工製品（Fleischmann, 2007; Stienstra, Watzke, & Birch, 2007）。因此，有必要針對此工具對人類生活、學習與工作層面的創新助益進行社會性思考，凸顯網路科技轉化社會生存方式與彰顯學習主體性的行動實踐作為，並因應此工具的鑲嵌與擴散特性，藉以描繪大學生透過此工具所能掌握的跨越時空界限與多元節點連結之學習圖像。

由於網路科技工具發展或創新擴散程度不一，不同社會分類群體對網路科技的近用機會、學習輔具、社群連結與實際效益等數位利基之思考意向及使用行為亦有所差異（Attewell, 2001; DeCastro-Ambrosetti & Cho, 2002）。不同人口變項特徵的社會分類群體在網路科技之近用與使用作為上，產生差異化的認知思考與行為意向（Brock, 2009; North, Snyder, & Bulfin, 2008; Ono & Tsai, 2008; Rau, Gao, & Liang, 2008）。學生的社會經濟背景、文化資本、階級習性與社會結構會影響其對網路科技的看法，且不同族群、階級、性別、文化或地理區位等社會標籤對其應用網路科技的認知、情意與感受等層面，亦表現出不同的思考習性與行為模式。

就性別分析而言，傳統或主流社會文化對女性在選擇網路科技融入學習活動的公平機會之思考及作為，容易受到網路科技意識型態及其想要從事的性別刻板化活動類型之引導偏向，影響其應用網路科技的公平或適性參與行為、良性同儕互動及自我效能之表現（Parker, Bianchi, & Cheah, 2008; Rommes, Overbeek, Scholte, Engels, & Kemp, 2007; Vekiri & Chronaki, 2008; Wajcman, 2007）。男學生比女學生願意花更多時間使用網路科技，表現出較佳且有效的蒐集、評估與利用網路資訊之網路素養，擁有正向的使用態度與行為表現（方紫薇，2010；田芳華，2009；黃惠英、陳冠鑫、陳威任，2006）。大學生對網路科技的使用行為深受其對此工具之認知影響，且對網路科技應用實務的看法，不只再現數位創新的工具性定位，亦連結性別差異的社